

祖乙宅村志

# 龙 井 春 秋

宅坦村民委员会编

# 序 一

编史修志,兴于太平盛世或治平时期,如明代的万历、嘉靖年间,清代的康乾时期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的世纪交替之际,我县再次出现编志修史的热潮,体现了盛世的新景象,实在可喜可贺。

来绩溪之前,就得知宅坦村是一个有着骄世历史业绩和丰富文化积淀的古村落,也是人才辈出的绩溪诸胡之一——明经胡姓人一大聚居地。通览了宅坦村村志的目录和概述,并借工作之便到宅坦专程走访,更感受到这一建村千余年古村落的魅力之所在。据阅读有关资料,宅坦村古称龙井,早在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当时的绩溪县令胡延进之子胡忠就在龙井东之山阜创设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sup>①</sup>,在国内颇具影响的清代学者汪梅村的《乙丙日记》及其人口理论就是在宅坦村写成的。明清两代,宅坦先人纷纷向外埠拓展经商空间,足迹遍及东南及华北,一些商贾携财在故里大兴土木,为宅坦村留下了许多气势恢弘、筑造精美的祠宇和古民宅以及意蕴深邃的门楼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察访宅坦村时,见到该村还保留了一大批历代的谱牒和村会议录等档案资料,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全、价值之高在绩溪乃至皖南堪称一绝。宅坦村地杰人灵,名流辈出。仅清代就有胡宝铎等三位进士,还有二十多人著书立说。元代的胡景精通理学,被明太祖勅为一名儒;清代的胡大有、胡光硕诗

<sup>①</sup> 关于桂枝书院究竟始建于南龙井还是北龙井,龙井派内存在分歧,宅坦一支认为始建于狮山,西村一支认定始建于葫芦岭之雪地,明嘉靖版谱也认为建于村南狮山的桂枝书院为胡久中迁宅坦后于宋绍兴十五年(1145)前后建的,于宋景德四年(1007)始建的桂枝书院则在北龙井之雪地,但自明万历至1998年各种版本的绩溪县志都认定村南水从石出的井为龙井。乾隆版统宗谱和龙井派宗谱以及民国版宗谱也与县志的记载一样,确认桂枝书院的始建地在村南龙井之狮山,明万历县志是这样记载龙井的:“曰龙井,在县西五十里,水从石了味甘而冽。”嘉庆版县志强调“龙”井:在宅坦,……”



画并茂,双双入选中国历代画家大全;颇具文才的胡梦华活跃于二十年代中国新文化文坛。如今,宅坦村父子同为高工教授,兄弟俱是博士后等高级人才更是不乏其人,少说也有 40 人之多,故有人又称之为“教授、博士村”。

盛世修志,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当今写志修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村志虽小,却具有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的存史资治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宅坦村志是江南山村尤其是徽州农村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宅坦村志《龙井春秋》的编写,不仅具有积累史料留给后人的作用,而且对于激发旅外宅坦人的思乡爱国之情也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来绩溪任职已逾三年,耳濡目染,对绩溪人民以及羣岭徽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应宅坦村民之约,为《龙井春秋》写序,我欣然受领,拙笔就成,以表对包括宅坦 1700 村民在内的 18 万绩溪父老乡亲的敬仰,也寄托我对绩溪这片赐予我诸多获益热土的一腔深情。

绩溪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富存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 序 二

唐力行

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是一个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区域,历史上就有编撰村志的传统。近日读了二本新编的徽州村志《龙井春秋》和《徽州文化古村——六都》。这二部志谱性质兼备的村志,细致地描述了古往今来村落历史的变迁,为我们重构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信息。从编撰体例上来说,祁门六都在历史上曾经三修村志,早在明代弘治年间程氏族便编有《善和乡志》,因而在编撰时沿用旧志体例;宅坦村在历史上没有修村志的传统,在体例上也就没有太多的束缚,较多地体现编者的创造性。宅坦村志开篇由概述、大事记统率全书,其后分为12章,依次为建置、自然概况、人口、农林副业、工商业、交通邮电、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军事政治、徽派建筑、传略选辑、乡村风俗。谱分3章,由谱牒、档案资料和世系源流组成。相比较而言,宅坦村志志谱结合的特色更为明显。应宅坦村志编委会之约,我十分乐意地为村志写一篇前言,略事评说。宅坦人能编出高质量的村志,实属不易,也足见徽州文化之深厚矣。

龙井是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的古称,与胡适的故乡上庄村接壤,位于绩溪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村域面积近七平方公里。宅坦与外界的联系十分不便,自古以来村民外出都要靠步行,翻过崇山峻岭才能抵达歙县和旌德的水码头,然后走新安江去杭州,再转水路至金华、衢州及江西的玉山、铅山,或是沿徽水(青弋江)北溯至芜湖,再经由长江去南京、苏州、上海和武汉等地。这也是宅坦的徽商外出经商的主要路线。直至1933年芜屯公路通车,宅坦人外出方可免去艰难

地跋山涉水,不过从村落到绩溪县城还得靠步行。千百年来宅坦的先辈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地方,那么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创造出傲世的古代文明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宅坦村志为我们考察这些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宅坦村位于竹峰山下,村落被东迤的竹峰山余脉葫芦岭和长岭环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村南有长岭横亘,因而有枕山面屏之势。但是由于没有溪河流过,从总体上来说宅坦的地理条件并不好。宅坦四方有四口井,其中南北龙井是有名的古井。但是四口井难以解决一村人的饮水和灌溉。千百年来宅坦先人们整山治水,在这里营造出一个适合人居的环境来。村民们在村落西北的山上筑堤拦截山水,营建起蓄水八千立方米的大塘—深塘水库。然后开沟渠引水入村,又在村里开挖了 170 多口水塘,各塘均有明暗水道相通,定期换水。这些水塘星罗棋布,洒落在村内外,犹如水渠串起的明珠,熠熠放射着光华。细察宅坦村民国时期平面示意图,可以看到人工开挖的沟渠从深塘引入村来,形成几“之”字形,曲曲弯弯缓缓流过全村,一支向东北方成双龙抱珠之势,抱住桂枝文会和胡氏宗祠,流向下门支祠周边的水塘。另一支则注入慕前塘、石井塘由西南出村。从整体上看这几个“之”字形又构成一个不很规则的井字形。与龙井村的井字暗合。疏通一村的给排水,具有强烈的实际功用,既方便村民洗涤、灌溉,又具有应急的消防作用。而实施这一工程的组织者则是胡氏宗族。至今,我们还能从一些名塘的形制上找到宗族的印记,例如占地近四亩慕前塘,原来是一处地势低洼的芦苇丛,有碍前门支祠澳瞻堂的风水,于是挖凿了此塘。它由前门支派下的桂、相、朴、桓、桢、梧、楫、枵、构这九个分支的胡姓族人共同挖凿而成。慕前塘的形状处处体现九字,如环塘的石驳岸有九个内角,泻洪闸门排水孔有九个,洗涤用石塘坎也是九级。再如占地近 3 亩坝下塘,它的造型也有独到之处,当塘蓄满水时,它是一口大水塘,而塘中水浅时,它又一分变为三口小水塘。小塘与小塘之间有塘壁间隔。后门支祠的坝下塘是由后门的胡社生等三支共同修筑的,其设计既含蓄又

明确的体现了这一点。宗族还担当起沟渠水塘的管理职能,务使沟通,永无雍滞,并以严厉的族规家法制裁污染水质的行为,使水质保持洁净。

徽州村落都十分重视水口的建设。徽州村落的选址最常见的是背山依水,水由高而下,经过村落,流向平芜之地。一般来说,村落的人口,就是水的出口。宅坦从深塘引入的水流有南北两个出口,因而先民们营造了两个水口。由于宅坦村大体是南北走向,其水口则为东西走向的两条绿色长廊。村北的水口树木栽植于人工垒砌的护坝上,林木高而密,树种为香榧、白果、柏树和柞树等,有利于阻挡北方冷空气;而村南有长岭横亘,水口林木相对稀疏,这种布局又不影响夏秋南来凉风吹拂,调节气候的功能十分明显。水口以及村内外的植树,大都是由宗族组织族人进行的。宗族对绿化十分重视,龙井民国版谱祠规中就有“护龙脉”一则。村落所倚之山是龙脉,其山势要蜿蜒起伏宛若行龙,则村基始有生气,宗族才能科举发达。这里面自然有迷信的成份。但是保护村落所倚之山的林木,才能使山中所储之水源不断地聚入深塘,确是与村落存亡有关的大事。从上庄沿着村北青石铺就的路面,聆听一旁水圳的潺潺流水,信步向宅坦走去,远远就可见到东西走向的水口林木,它们是村落的大门,起到村落与外界隔绝的作用。进入水口便是碧水涟漪的大塘,以及若隐若现的桂枝书院、文昌阁。这是村落外部空间的重要标志,也是村落文化内涵的灵魂,从而为宅坦开辟了丰富的人口序列空间,把你漫漫导向祠堂、民居,导入村民们的生存空间。南北两个水口形成宅坦村落相对封闭的小小一统天下,使一村之民具有共同的安全感。这种居住环境有利于文化的积淀,人文遗存的保留。徽州“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的格局,以及“东南邹鲁”、“文献之国”的蔚然气象,与徽州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对应的。

宅坦在群山环抱中,其生存资源并不丰富。全村耕地 1267 亩,其中水田 1179 亩,旱地 88 亩,林山面积 5523 亩,人均耕地不足 0.7 亩。每年都要从旌德运进粮食以补不足。在并不充裕的物质条件

下,村民们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古村落文明,是与宗族、文化、商业相关的。我在《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徽州地域已形成宗族组织、文化科学和商业的良性互动,这三者之间宗族居于核心地位,这便是该地域社会整体的特征<sup>①</sup>。应该说宅坦村具备了上述特征,并且是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创造了古村落的文明。《龙井春秋》全书体现了这一点。

先来看宗族。宅坦是胡氏宗族的聚居地。宗族聚居必得具有四个要素:族谱、祠堂、祖坟和族田。1007年始迁宅坦祖胡忠定居龙井后曾八修族谱。徽州宗族继承了中原古宗族的传统,有着严格的谱系制度,就给族人造成一种神圣感和敬畏感。族人的最后归宿就是上谱,进祠。族人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开除族籍。在徽州这样一个宗族世界里,一个被宗族除名的人是无地容身的。祠堂里还设九案特祭,对供奉于寝室的“百世不迁之主”,能干,配享,酬劳,土地,忠孝节义等设立九案分祭,以示对始祖、迁祖或对造祠公益等有突出贡献者的敬意和缅怀。太平天国战乱时,族人胡志高丢弃全部家产,背负宗谱逃难,为宅坦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明嘉靖版龙井胡氏族谱和乾隆版考川明经胡氏统宗谱(如今传世的唯一一套),其本人也就成了宗族的英雄。宗族通过一系列仪式和家法祠规来规范族人的行为,加强族人的凝聚力。

宅坦村拥有七所祠堂。明代永乐九年(1411)二十世胡英定的四个儿子分为四个门派,即前门、后门、上门和下门。其中,22世时前门派再分出一支,即中门派。自此,宅坦胡氏分立五大支祠,即前门澳瞻堂、后门继序堂、上门豫格堂、中门敦睦堂及中门分支祠、下门笃伦堂。上门为长房门派(长房长子为宗子)。天启二年(1622)五个门派合力修建宅坦胡氏总祠——亲逊堂。由五个支祠共推选三十六班头轮年负责施工,共建了六年。该祠气势恢弘,三雕精美,成为绩溪

<sup>①</sup>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第8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三大名祠之一。从此,亲逊堂就成为宅坦胡氏的最高权力机构。亲逊堂由宗子以及祠首和司事管辖。从宗祠会议记录簿看,村里每有关系族人利益的事情,就要召开会议讨论,参加者少则十余人,多则数十人,共同议决,体现着一定的族内民主精神。每一门派,也有自己的组织领导机构。从而形成总祠一支祠一族人的多层控制网络。

墓者慕也,是追墓祖先的处所。宅坦至今保存宋代祖墓。宗族通过祭祖的仪式来强化族人的凝聚力。旧时祭祖,清明前一天祭扫各支祠祖墓。清明节上午族丁抬全猪全羊去位于原旺川乡医院背后的二世祖胡延进衣冠墓祭扫,中午再祭扫宗祠前宅坦始迁祖胡忠墓。然后再各自扫自家近祖墓。

祠堂拥有田地和山场的多少是衡量一个族派是否兴旺的标志,也是一个族派存在的物质基础。亲逊堂和桂枝文会拥有祠田学田206丘,每年收租8000斤左右。祠堂的收入主要用于祭祀活动,也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济贫,救助族中贫困者。每逢歉年,宗祠往往与好善乐施的族人一起,向余粮户或到旌德购米平粜,亏空由祠堂和行善的个人承担。宅坦宗祠主持的最后一次平粜是1947年春。

在徽州山区,宗族要生存、发展,就需要功名地位和财力的保障。胡氏宗族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以及胡氏商人对教育的投资,使宅坦人才辈出,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胡氏在宅坦定居的起因就与文化教育相关。北宋开宝末年,龙井就有一流的书院(书院名失考)吸引当时的绩溪县令胡延进送儿子胡忠来此读书。1007年,胡忠复归龙井,并在龙井建造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其后,宅坦先后创设了鞏西文社(乾隆胡挺重修,捐田十几亩为学田)、玉成文会(嘉庆时村人以四十九个股份购置田产创设,分七班轮管,除招子弟读书外,还用田租收入操办祭事)、惹云书屋(乾隆时胡大锦修)和桂枝文会,宅坦先人人仕者有140人。清代出了三名进士,他们是乾隆年间胡延龄、胡志浩,同治七年的胡宝铎,还有举人、秀才等不下五十人。出任教谕、训导者不下十人,先后入载县志《学林志》者14人、《大学志》者2人。历代人文荟萃,共有三十人有著述问世。清末新政,国人开始兴

办新学,宅坦也得风气之先。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胡蕴玉、胡幼圃等三人就创办了宅坦新学—桂枝小学校。悠久的文化传统使龙井胡氏在地方上拥有崇高的地位。

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大多胡氏商人成为贾儒结合的儒商。宅坦徽商主要从事的是造纸、百货、茶叶、徽墨、国药等行业;主要分布在江苏常州、苏州、宜兴,浙江衢州、兰溪,江西铅山、玉山,及本省歙县、芜湖等商埠。晚清村人经商由江浙移师上海,上海成为村人经商的主要商埠。商业繁兴时从业人员几逾村内适龄人数之半。徽商的经营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获取原始资本,展开商业竞争,建立商业垄断;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联合宗族势力,建立商人会馆,投靠封建政权。有着强烈宗族情感的徽商在致富后,会源源不断地将其一部分利润输回桑梓之地,捐助建祠、修谱、置族产、办族学,并在家乡修建精美的宅第亭园。民国二十四年的宗祠会议记录簿上录下九月十日徽商兼任亲逊祠代理执年的胡昭培(字子萍)的一份声明告诉我们,当时宅坦的经济状况极其艰难,宗祠无法按常规向族人收取丁口捐以充修祠费用。只得求助于经商族人借垫。祠堂修好,但费用仍无着落。最后由商人宣布借垫之款捐入祠堂了结。办学的情况也是如此。1917年由清代进士胡宝铎的次子徽商胡文骐(1872—1927)等出资一千元生息,创办资政小学。1931年经费困难停办。1932年富商胡家祺重办桂枝小学。次年由旅外同乡劝募续办。

部析《龙井春秋》大事记,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族、商业和文化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明代后期、清代是宅坦宗族势力强化、商业繁兴和科举发达到良性循环之时。我们再来看《徽州文化古村——六都》,相比较而言,祁门六都在宗族、商业和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薄弱环节。六都的经济是单一的林业。六都善和程氏是以经营田产山场起家的,产业均在本村。从十八世程新春至二十一世程昌,大约在十五世纪的一百年间,是善和程氏家族的鼎盛时期,由于山场经营得好,与宗族、文化发生了良性互动。六都村中

的 17 座程氏宗祠, 15 座牌坊, 大多数建于此时。这段时间, 程氏通过科举考试, 中举人者 4 人, 进士 5 人, 任 3 品以上高官 5 人。但是, “发生在弘治六年(1493)和嘉靖十三年(1534)的两场大火, 几乎将其家业烧毁殆尽。在无外来资本(如徽商)的情况下, 程昌力图通过修纂《窆山公家议》, 以加强家族管理来复兴程氏家族, 只是一厢情愿, 程氏无可挽回地走上困顿的道路”。<sup>①</sup>

处于良性互动中的宅坦村民世代代在这里生息, 他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大多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然而崇山峻岭并没有把徽州乃至小小的宅坦村与传统中国的大环境完全阻隔开来。千百年来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也会在这里引起反响。但是, 由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徽州社会具有特殊的应变力, 始终保持自身的稳定。《龙井春秋》中涉及的社会动乱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明清交替, 异族人主中原。顺治二年(1645)四月南明帝宏光出亡, 族人成立保身会以自救。次年二月, 徽州府东山营得知宅坦、上庄一带还有许多人未剪发, 扬言发兵进剿, 村人闻讯惊恐万状, 忙着人去官府送钱银, 事遂平息。当时地方上出现打起反清旗号, 也劫掠百姓的土兵。宅坦人对索饷的土兵恨之人骨。顺治五年, 土兵为清军所剿灭。十一月宅坦为庆贺兵乱渐平特做还愿戏。在宅坦所发生的一切,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一中所指出的: “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 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 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 亚洲各国不断瓦解, 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 与此截然相反, 亚洲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要素的结构, 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第二、四次动乱分别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兵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全村人口达 6000 多人, 清咸丰同治年间, 死于战乱和为躲避战乱而举家外迁者难以计数。村内人口

<sup>①</sup> 程成贵:《徽州文化古村——六都》, 第 16 页, 2000 年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印行的非正式出版物。

锐减至不足一千。迄至民国,全村人口一直在七、八百之间徘徊。村志的作者颇有历史感,他从村里建于明代后期胡应培老屋所受的创伤,来看两次动乱对宅坦传统文化的摧残。胡应培老屋厅堂的前柱有太平军留下的砍削斧痕。厢房的窗棂镂刻有精美的木雕,画面上有官员、读书人为太平军所不容,他们的头颅被削去,只留下农夫和耕牛完好无损。但农夫和耕牛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他们被归入四旧,其头颅终被削去。文革期间,千百年遗存的文化古籍被焚毁,大量三雕精品遭捣毁,就连抗战时也没有停办的村小学被迫停课。可见这是一场更为野蛮的消灭文化的运动。

第三次动乱则是抗日战争。抗战八年徽州未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是江南唯一的后方基地。徽州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在宗族会议记录簿中我们可以看到村民们积极参加抗战的记录。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十六日的会议记录中有:“第二次破坏公路,由公众暂借款七十五元,应如何归还案。”破坏公路是为了阻止日本鬼子进入徽州,其所需费用会议议决:“由亲逊祠拨付(而待联保清单拨付后)”。三十四年(1945)三月的祠务会议上讨论抗日军属的抚养问题:“为抚养胡乾健出征家属应如何处理案”,决议:“每年秋收时本祠津贴四秤,此生直至该壮丁之母逝世为止。如该壮丁回家后,即行是否停止”。

每次动乱过后,胡氏族便急于修复祠堂。咸丰十一年(1861)亲逊祠遭破坏,乱平后即开始修建,至同治十年(1871)修竣。清末民初又新建了三屏风楼。抗日战争前后,宅坦村民曾于1933、1937、1946三次维修亲逊祠,每次均成了专门机构,下设总务、经济、工程、募捐、监察五股。维修经费由征收丁口捐、特别捐解决。前揭胡昭培捐款修祠堂,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马克思所说:“这种社会的基本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这一基本要素,除了我们通常说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大一统专制政权,还应包括介于小农与政权之间的宗族组织。

胡适在为宅坦近邻旺川《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说:“将来有了无

数存真传信的小谱,加上无数存真传信的志书,那就是民族史的绝好史料了”。宅坦村志是一部存真传信的志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民族史的绝好史料。例如,村志在记载“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使用的便是春秋笔法:“50年代后期,土高炉炼钢铁需要木炭,将水口许多数百年树龄的银杏、香榧、柏树、朴树等古木砍伐殆尽”。“从1960年11月至1961年5月这半年里,社员每月人均口粮只有2斤。村民生活极端困难。少数村民患浮肿病住院,死6人。不久,大队领导胡洪谊、胡礼安、胡正祥等顶往种种压力,暗中解散食堂,发动村民上山挖蕨、葛取粉,度过粮食关”。对大队领导的义行加以褒扬。社会变迁之中,也有不少进步因素。例如,大队组织农民在“1965年改建水库,水坝高16米,总库容量达10万立方米。1975年又对大坝加砌分层台阶式护坝增库容量3.4万立方”。使原来只有8000立方米容量的深塘水库大大增容,使宅坦即使在大旱之年其生产、生活用水也能得到保障。这是前所未有的。

村志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例如宅坦人的通婚圈。作者探讨了宅坦人通婚半径长短交替变化的规律:第一阶段:宋迄明代宅坦人以家居务农为主,通婚局限在本都10公里范围内,最远不过80公里的邻近各县,与宅坦人通婚的姓氏有31个。第二阶段:清代以来,随着宅坦人旅外经商族人的增多,在外埠娶妻妾者比比皆是,通婚半径延伸至800公里,嫁于宅坦的外地女子的姓氏有90个之多。民国年间,村人旅外经商做工仍多,通婚半径较清代又有延伸,达1500公里。第三阶段:建国后由于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控制人口外流,村人外出经商做工门路梗塞。宅坦人的通婚半径又缩短为方圆不足十公里,与通婚范围不足一里的本村女子的成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村人外出打工经商者渐多,通婚圈也随之扩大为1000公里,赴日创业的有娶东洋女子为妻者,通婚半径达2000公里。通婚的半径是受社会环境和经济水平的制约。通婚圈过小,不利于居民的体质进步。改革开放后,婚姻圈进一步扩大,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好处。



说到胡适,自然要说一说介于胡适家乡上庄与宅坦中途的风乎亭。建于乾隆年间的风乎亭,其谐音为“分胡亭”,有暗指亭南的上庄胡姓为假明经胡的意思。这段有关乡村宗族生活的公案,是由历史上宅坦、上庄这两大村争夺七月会的首办权和五朋中的头朋引起的。其实,考诸考川统宗谱、宅坦和上庄的宗谱都有一致的记载:龙井(宅坦)和杨林(上庄)一至五世同祖,均为昌翼、延进、忠、昉、文谅。有关始祖、远祖的生卒年、墓葬地、名号的记载基本一样。上庄在乾隆修谱的序言中记载:“七世端五公子忠公迁鞏北龙井,十二世德真公迁杨林,二十世七二公始迁上川”。所不同的是考川宅坦认为胡忠是胡延进的儿子,而上庄的世系认为胡忠是胡延进的第七世孙。根据胡维平的考证,明经胡的第七代胡德真从龙井迁杨林,即今上庄杨林桥一带;其第八世孙胡七二是上庄胡姓始迁祖。因此,胡适除了是明经胡杨林派(上庄)的后裔外,同时也是明经胡龙井派(宅坦)的后裔。这个历史陈年老帐似乎已经翻过去了。1999年11月,始祖昌翼公逝世一千周年,宅坦和上庄的胡氏后裔一起赴考水寻根祭祖,并合影留念。这是一场文雅的争执,足见胡适在桑梓之地影响之大。世人喜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而宅坦人则可进而说:“我的族人胡适之”。

宅坦的胡氏亲逊祠在历经了350余年的历史沧桑后,终于在上个世纪的70-90年代被拆除,改为小学校舍。在胡维平村长的陪同下,我走进了亲逊祠,昔日享堂的遗址盖起了教室。留下的是登上享堂的台阶。既可从中间登九级台阶直上,又可从两侧先登五级再跨四级台阶步入享堂,这种暗合“九五”之尊的台阶,保存了宅坦人对昔日辉煌的记忆。祠堂已荡然无存,其木雕精品也被县文物部门收藏。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宅坦的有心人保存了众多的文献资料,内容涉及宗谱、祠谱、宗祠文档,建国后各个时期的档案,涵盖时间为明嘉靖三十五年至1990年,内容之多、价值之高,为村史资料之罕见。这些资料为我们在宅坦从事田野考察、重构古村落的实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可以预见,宅坦必将以其丰富的人文内涵为世人所瞩目。

2001年盛夏于沪上

---

注：唐力行教授系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徽学家。现为上海师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他的主要论著有：《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新编中国历史·明清》、《中国大十商帮（合作）》、《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主编）、《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主编）等。

## 序 三

胡昭璧

世纪之交的五月显得格外火红,汇聚着春天的云彩、阳光、生机与兴旺。我一个耄耋老人怀揣着火一样的热情与渴望,从南京来到一生未曾到过的家乡——安徽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10余天来,我走访村民,座谈宅坦村建设和文化教育发展,深深地被家乡悠久的历史积淀所感染,被家乡的秀丽山水所吸引,被乡亲们朴实、盎然的精神风貌所感动。所有的思念,都被五月之行的慰藉所释放,一种炽热的情愫在心中弥漫,驱动我拿起笔将万千思绪、万端感慨汇成《龙井春秋》的序。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卷中,中华民族曾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灿烂文化写下了领先于世、光照千秋的篇章。遗憾的是十五世纪后,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和社会政治腐朽,中国逐渐落后了,以至于近代陷入了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是,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沉沦,而是前仆后继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经过伟大的革命终于在本世纪中叶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从此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现在,中国人民正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立足于新的历史实际,着眼未来,励精图治,扬帆起航,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彼岸奋勇前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是跃出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绚丽红日。再创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中华民族以更加强劲的英姿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日子来到了！

新千年伊始，宅坦人为弘扬祖国历史文化，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团结遍及世界各地的同宗后裔为统一中华、振兴宅坦作贡献，承前启后，致力编纂《龙井春秋》，召唤后人从千年村落的发展历程获得启迪，努力振奋精神，殚力发展家乡经济，服务于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此举实属爱国爱乡之举。

现在，《龙井春秋》经过众人共同努力出版了，这是绩溪宅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龙井春秋》如同一幅画卷，展示出龙井宅坦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宅坦人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发奋图强，立志改变家乡面貌，力创新业绩的精神风貌，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浓郁情意。无论怎么说，这部村志的出版，无疑会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和现实的信息资料。给人一种感悟和力量。

《龙井春秋》文笔朴实，不尚华丽，尊重史实，力图在前人方志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和详今溯古的原则，以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同时，兼顾“存史”和“教育”两方面的作用，在内容上，力求做到志谱结合，重点突出，通古贯今，立足当代，以反映宅坦历史文化的时代特征。在体例上，以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主线，贯穿各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按照“宅坦经纬”、“谱海纵横”上下篇，分别用若干独立章节架设全篇结构，且附加照片图表，以“概述”统括全篇，彰其因果。

总之，《龙井春秋》的出版，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庆贺！我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战士，追随中国共产党大半生，有幸能够在耄耋之年，最后不多的日子里，为编纂家乡村志、支援家乡建设尽一点绵薄之力，将来见马克思时也无缺憾了。

二〇〇〇年五月于南京